

张鸣岐
著



董仲舒教育思想初探



张鸣岐 著

董仲舒教育思想初探

雷洁琼题

吉林教育出版社

董仲舒教育思想初探

张鸣岐 著

责任编辑：郑长利

篆刻：山谷

封面设计：王劲涛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 375印张 3 插页
105, 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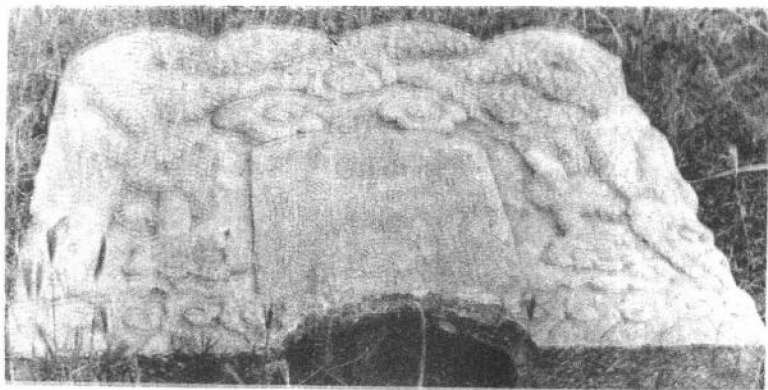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4册 定价：1.90元

印刷：长春市第二印刷厂 ISBN 7-5383-0591-2/G·561



董仲舒石像

在今河北省枣强县旧县村。像高2.5米，面向南，背后镌有“万历三十六年十月旧县村施财弟子管正尊韩安辅妻姚氏”字样。此像冕、笏及须、鼻部分损毁。



董子书院碑额

在今河北省景县董故庄。原碑因年久失修及“文革”中损毁，现残存此碑额一段，上刻“景州重建董子书院记”。碑身遗失不见，建碑年代尚未查明。估计其碑文即是本书附录二：明人李东阳之记。



董仲舒墓地，传称下马陵，在今西安市和平门内迤西一段地区。现在该地名称，仍标记下马陵。此照系作者于1984年秋赴该处考查访问时所摄。

序 言

在中国的古代教育史上，汉代的董仲舒是一个在教育思想、政策及实施上起作用的和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一位教育家。他处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正当汉王朝要求大一统和开拓的兴革之际，在政治上要求改革汉兴以来所采取的“执道任教”的方针路线，在思想学术上要求结束“百家殊方”、“所繇异术”的局面，在教育上要求调整只靠自发的私人设学和扩展历史的官府学吏制度与察举等。董仲舒适应这种历史转折的时代要求，表现为一个具有卓见的思想家、改革家和名儒大师，提出了作为新的政治、学术指导思想的“独尊儒术”的学说主张，同时拟制了与之相应的以儒学为宗旨的封建国家教育建设工程。因此在历史上他被称为“汉代孔子”，这虽然是封建的尊号而且也有溢美之虞，但却说明了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董仲舒确实在封建社会即在西汉的变革时期，继承、发扬特别是改铸了先秦儒学而构制成汉代新儒学，为维护与强化封建统治秩序提供了并推行了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论，谋划并实施了儒学的教育方案。可以说，他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奠定了基础。其教育理论与设施，在历史实践中积累为我国教育上的遗产，曾在一定时期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深远的消极影响和毒害。对于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研究、分析和评

价，对于我国教育遗产的清理，是我们教育史的研究任务。特别是由于董仲舒教育理论的历史作用，就更需要我们对其中教育思想体系进行比较详细、深入和全面的探讨。

我们要继承我国自古以来的珍贵的教育遗产，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总的历史情况来看，董仲舒表现顺应历史潮流与社会发展而要求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与改善民生，在教育上做出了某些可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创建，同时他自己表现有相当的师德与师才，教育有方，培养出了许多人才。这些可以说是在教育史上的贡献，是应予肯定的评价。当然从根本上说，这一切都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我们不能苛求于他为人民服务，也不应因为他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就否定他在教育上所做出的一些有益的、合理的成就。我们坚持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进行全面研究，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讨论董仲舒教育体系中的精华部分，也必须剔除其封建的唯心的糟粕，而且必须彻底批判和肃清其流毒。我们要去伪存真，使古为今用，为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而探讨我国固有的丰富的教育遗产，以资借鉴和认识一些可贵的经验教训，并发掘和发展其中具有一定规律性的东西。

本书题名为《董仲舒教育思想初探》。所谓“初探”，有两层意思。一是初步的探讨。二是以董仲舒教育思想为研究课题，在一些刊物上散见发表的某些论文，在迄今出版的《中国教育史》中有一章一节的阐述，但作为专题出版的专书尚未见到。此或是作者孤陋寡闻。现在可以贸然估计，迨这本拙作问世，虽不敢说是最初的一本董仲舒教育思想专著，也可以说是最初出版的专著之一。这表明拙作是初生之物，是幼稚的产品。因此，这本《初探》更需要广大读者和专家们提出批评和指正，以匡不逮。

本书是基于任教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多年体验感受，以及研习

了现代史学界、哲学界专家和教育学者们一些有关的科研成果所得到的启发而撰写的。教育史虽是一门相当独立的专业史，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还是密切的和广泛的，在一定范围上可以说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因此在研究本书的课题上，就不能独守在所属的教育史门户之内，闭门自修，必须学习、了解其他有关学科，要做开放性、包容性的研究，当然主要是进行本学科独立特性的探讨，以阐发教育史中教育思想的特点。本书立足于上述的认识，遵循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力求陈述应有的翔实史料，作些必要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从中阐明问题，进行分析概括与评议。由此阐明董仲舒在教育史上不是独身一人的个性活动，他的教育思想也不是无原委无基础地从心所欲地油然而生。他是一定条件下的历史人物、社会角色，从事于一定社会关系和地位的教育活动。从纵的方面看，在时间上他上有渊源，有所继承和发展，下有流传和影响。从横的方面看，在空间上他有同当时当地情景密切相联的作为和作用。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充分表现着论是有所而论的，行是有所为而行，在人际间有调谐有对话，有交锋与挑战。我们对其教育言行的成就与弊端、积极与消极作用及其一生功过，要做全面衡量，同时也注意到他比其先辈有所落后的和比较正确的新生的东西，要看到这些差异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力求作出比较科学的公正的述评。对此，本书针对具体问题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这种做法是否得当，尚待商榷。特别是其中一些分析与评估，限于作者的理论、业务水平不足，必会有若干不当以至错误之处，谨请专家们读者们斧正一切。这也就使拙作得到“抛砖引玉”之效。

本书的初稿完成于1962年。当时是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写出和交纳的。但那时我们工作单位对科研成果的处理，一般是采取“收发”的办法，即收下后遂即发还。我在拙稿发还后，

连续地下农场和下乡等，一时无暇再搞科研或修稿。随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的存书与文稿也就堆扔起来。尽管“四人帮”肆虐一时，终有我党的正确路线领导，及时地“拨乱反正”，贯彻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工作，开展两个文明建设。由此，我得重新开始教研工作，遂即清理旧物，探寻先前所写的讲义等，意外地看到本书的初稿在“尘封”之中，捡起来翻阅一遍，觉得尚有可以修订的意义与基础，遂又列入科研计划。然而这时我们的教研组织连“收发”的办法也没建立起来。每人的科研各自设法。但我不同于孔夫子那样既能“游说”于各邦，又有门人子路等代为“问津”于四方。由此，拙作就又停笔和搁置下来。

迄1984年春，有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李国筠同志光临，为上海教育出版社拟定出版的《中国历代著名教育家评传》一书组稿。我应邀将原有的拙稿缩写出3万字，作为该书的董仲舒传。至1986年初夏，有素不认识亦无联系的吉林教育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前来问讯，我即奉告有旧作董仲舒教育思想专著一稿可供审阅，但还需要一定时间进行修订。一切承蒙该社赞同和协助，并提供了宝贵意见，特别是要求作品的社会价值和效益。这对于拙著的修订与问世起着催化与助产的作用。我在这里谨表谢忱。

应该特别指出，在去年(1986)9月间，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召开了全国性的董仲舒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我幸蒙该所及大会相邀参加，得到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会中听取了当前哲学界老、中、青年专家们的报告和意见，受益良多。我在这里谨向河北省哲研所及与会的各专家同志深致谢意。

还要特别提出的是，现在我们燕京大学校友会会长、社会学家雷洁琼教授，以82岁的高龄，在国事、社会工作和讲学与科

研的百忙中，特意抽出时间来为拙著题签。这使我不胜感激之至！谨此鸣谢。

还有，河北省景县文化馆王立泉同志热切关怀本书的工作并取得他的协助，赠给了董仲舒的明代石雕像及董子书院碑额照片各一枚。这都是董仲舒故里的可贵的古文物摄影。我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教育史博士、硕士研究生毕诚、于龙、王岚、潘丽娟、季苹同学为拙著誊清书稿，这充分表达了我国优良教育传统的师友之谊，特别是发扬我国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同志共事精神，我铭感于怀并以自励。

张鸣岐谑于北京北太平庄爱晚庐

1987年7月14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董仲舒的生平及其修学与教育工作	(1)
第一节 早年的从学和执教	(2)
第二节 中年时期的从政与授徒	(4)
第三节 晚年致仕、著书传道	(13)
第二章 董仲舒的教育政策思想及其实施	(19)
第一节 尊崇儒学以统一思想的教育宗旨	(20)
第二节 设太学以养士、行贡举以选士的教育 兴革	(28)
第三节 兴“教化”以“化民”的社会教育	(40)
第三章 论人性与教育	(45)
第一节 性三品与“中民之性”善恶二端说	(45)
第二节 人性的发展与教育的作用及其政治 意义	(56)
第四章 关于纲常的道德教育及其教育原则方法	(66)
第一节 “三纲”、“五常”的道德教育	(66)
第二节 道德教育原则方法与修养	(95)

第五章 论教学与教师.....	(109)
第一节 论教材与教学原则方法.....	(109)
第二节 论教师.....	(122)
附录一：董子祠堂记（元·曹元用）	(126)
附录二：董子书院记（明·李东阳）	(127)
附录三：董仲舒事略及时事年表.....	(129)

第一章 董仲舒的生平及其 修学与教育工作

公元前3世纪初，汉王朝取代秦朝的统治，建立起新的封建帝国。它鉴于秦末农民起义的力量并汲取秦朝严刑暴敛以致败亡的教训，遂采取了一定“无为”的策略，实行了一些“生养休息”的措施，因而安抚了民心，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力，取得一定的经济好转和政治稳定的局面。汉王朝表现着封建社会上升和前进的趋势，从建立政权统一国家之时起，日求改革以巩固和发展其封建秩序。在此形势下，先后有许多博学而怀持政见的儒者们，相继挺身而出向汉天子出谋献策，倡议以儒术治天下。如在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时，陆贾力陈文武并用，行仁义，法先王；叔孙通依据儒礼为汉王朝制定朝仪。至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数奏陈政事疏，强调摒除亡秦虐政而兴仁义^①，等等。迄汉武帝刘彻即位（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胸怀宏图大略，努力于除旧布新以求进一步开拓封建事业，急切强化皇权以求加强统一与维护其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在这样封建社会发展的要求下，董仲舒作为整个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便应运而生。他表现为具有卓见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极力尊扬儒术而负有盛名的一位有巨大影响的教育家。他十分周密地阐发了儒

① 陆贾、叔孙通、贾谊事迹，见《汉书》中各该本传。

家的封建思想理论和政治伦理观，对于封建文教工作提出了一整套的设计方案。他成为具有深邃思想和政治抱负的名儒大师。可以说，在一定意义和范围上，董仲舒堪称为汉代封建政治与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改革家。

董仲舒，汉代广川（在今河北省景县境内）人，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中经汉景帝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去世。^①

这说明他是一个生当汉王朝初兴和发展时期的人物。其毕生事迹，表明在他的早年、中年和老年三个时期的历史活动中。

第一节 早年的从学和执政

董仲舒自少年至中年之际，努力求学并开始教育工作。

他出生的家庭富有田园、牛马和藏书，这使他在早年就享有优越的求学条件。同时，自汉兴以来，朝廷日渐重视和察举负有德望和博学之士，任以官职而为汉王朝进行“建国君民”的工作。这就促使董仲舒怀持封建政治抱负而勤奋修学。他在家庭教育和就学于当时儒师的私人教学下，刻苦学习，精心读书，以“三年不窥园”^②的闭门钻研精神攻读儒家典籍，兼习先秦诸子学说，从中吸取阴阳五行和法家等思想，把先秦的原始儒学塑造成为适于汉朝封建统治要求的汉代新儒学，即以儒学的王道、仁义政治伦理思想为主体而贯彻神秘的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之说并阐发礼法结合的主张。董仲舒治学着重研究儒家法典《春秋》，特别探讨以申明《春秋》微言大义而成为当时显学的《春秋公羊传》。

① 多数学者考订董仲舒生卒年为公元前179—前104年。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历史人物辞典》载“董仲舒（前180—前115年）”，可资参考。

② 《汉书·董仲舒传》，以下凡引此传，均不再注。

但是他把天意、阴阳之说附会到公羊学中，以阐发他关于《春秋》的思想理论。在他的著述中，鲜明地讲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故圣者法天”^①，“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意是施行“阳尊阴卑”的，故“务德而不务刑”^②。又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③，君、父、夫为阳而为贵，臣、子、妇为阴而卑。总之，董仲舒主张《春秋》的要旨，在于“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万民之欲……正是非，见王心”^④。他特别以天道、阴阳之说阐述奉天、尊君、正名、正道一统的思想理论。董仲舒的这种关于《春秋》微言大义的思想理论，学成于他的早年时期。因此，到了中年于汉景帝时，因精于《春秋》而被任为博士。

关于董仲舒的治学及其专精之处，在当时曾向董仲舒问学求业的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6年）明确地讲道：“余闻董生曰”，从而指出董仲舒申述《春秋》之义在于“达王事”^⑤；还称道：“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⑥；又说他“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特别指出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⑦。至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则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⑧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① 《春秋繁露·楚庄王》以下凡引此书中文文章，不注书名，只注篇名。这里所引《繁露》各篇，并非董仲舒早年的著作。但其中思想是在早年修学形成的。

② 《阳尊阴卑》

③ 《基义》

④ 《俞序》

⑤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⑥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⑦ 《史记·儒林列传》。以下引此，简称《儒林列传》。

⑧ 《汉书·五行志上》。

董仲舒在中、青年之际，成为当时学问渊博，兼通五经的《公羊春秋》的品格，致使“学士皆师尊之”。由此，他收授门徒很多，即开始教育生涯，进行“传经行道”儒师工作，为汉王朝培养统治人才。应该看到，董仲舒作为卓越的教育家，就不是一个仅仅授业解惑的经师，而是一位培养德能兼具，通经致用，治世之才的人师。还应知道，自春秋时期官学失守以来，迄至汉王朝建立官学制度之间，在社会上教育得能维系进行，学术得能传递，人才得能培养，除了皇室、公卿等贵族官僚及名门对其子弟特设师、傅及进行家教外，则主要依赖于私人设学授徒和民间的家传世业。董仲舒也就是从家庭中和受业于当时私人讲学之门而培育起来的，由此，在自己学成业就，随亦从事于私人的教育活动。他收徒众多，不能一一亲授，就使学习年久和学业有高徒代为教授新来的弟子，以致有些弟子对他是“莫见其面”的。

第二节 中年时期的从政与授徒

董仲舒在中年时期，登上了仕途，积极为汉王朝实现封建大一统事业出谋划策，提出“改制”、“独尊儒术”与“推行教化”等。

他在年过30岁时，因专精《春秋》，于汉景帝时被任为博士。当时有和他同治《公羊春秋》的齐人胡毋生也被任为博士。博士是沿袭战国后期至秦朝的一种官职，其主要职务是“掌古通今”，博览群籍而参与议论国家政事，祭祀及各种礼制等，以供皇帝咨询的一种顾问之官。当时的博士们在学术掌握上相当广泛和复杂并各有专精，有精通儒学的，有精通诸子学说的。史籍所载，早在秦代的“博士官所职”，就有“《诗》、《书》、百家语者”。在汉朝初立迄于文、景之时，封建政府为了稳定政局和恢复生产，采取道家中尊奉皇帝、老子的黄老学派所倡导的清静无为与刑名之

学作为政治主导思想。然而自汉兴以来，诸儒“得修其经艺”，汉高祖任用儒者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惠帝以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之弟孔子襄为博士；文帝使故秦博士伏生授《尚书》，遣原学申、商刑名的晁错从治《尚书》而诏为博士；景帝以轅固生为《诗》博士，以胡毋生、董仲舒为《春秋》博士等等。这说明在汉代初期，封建王朝日渐看到儒学维护其统治的作用，并设立儒者专精一经的博士。可以说自秦以来，所任的博士是杂有各家学派的，但从儒者占多数并据有相当的力量。至汉代初期以黄老之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情况下，儒家尽力多方表现出其学说有维护封建秩序的效能，但也只能作为当时统治思想的一项补充或一个辅助部分，却还不能占统治地位，儒学博士也得不到重用。

当董仲舒被任为博士，说明他学成出仕，从此登上了仕途，但正当“景帝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这里主要指儒学博士而言——笔者）具官待问，未有进者”。^①所以董仲舒虽已为博士官，然不任事，无任何权位，只是一种仅供天子咨询的闲散官职。由此，他可以在任官之中，还能随意收徒进行讲学的个人教育工作。这不独是董仲舒如此，当时的其他博士们以及许多担当其他官职的学者也大都从事讲学授徒的活动。这种任官修学和亦官亦教的情况，可说是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游宦授徒和“仕而优则学”的一种可取的历史实践与传统思想，也可以说是延续了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士“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②，并广收弟子而授学的一种具有发展学术与教育事业意义的遗风。在这里需要指出，在汉武帝无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诏令太常等讲议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前，董仲舒等博士的收徒

① 《儒林列传》

②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